

张元：艺术家是最软弱无力的人

■快报记者 倪宁宁/文
快报记者 唐伟超/摄



作为评委,张元正在审片

张元,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,此次到南京,是应邀担任“第6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”的评委。

他顶着一头标志性的怒发,但是语调舒缓、松弛。从第一部电影《妈妈》开始,20年过去,他似乎已经从一个叛逆者,变成了一个建设者。“我们看到太多虚假的东西之后,就想:你是否能让摄影机镜头‘看到’一点儿真的东西?”这是张元拍摄《妈妈》的初衷,也是他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电影理念。

不做端着的、拿腔拿调的“张艺谋”

要让镜头“看到”一点儿真的东西

星期柒新闻周刊:很多访谈都是从1989年谈起,也就是你拍《妈妈》的那一年。我们把时间往前推。你是南京人?

张元:严格说,是我小时候在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。我父亲是南京人,后来到苏北工作,我也就去了。不过我经常来南京。我家人大都住在南京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怎么上的电影学院?一些学院出身的导演说读书那会就是看录像。你也看了不少片子吧?

张元:我最早要考的是美院,因为喜欢画画,也学过,可是没考上。复读两次之后,我报考了电影学院摄影系。做电影,可能跟对文学有兴趣有关,而电影跟文学应该距离不远。

在电影学院最大的幸福,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优秀影片。我在大学一年级就和法国电视台一起工作,为他们拍摄纪录片,从他们那儿,也看到许多电影。现在我还是很怀念那个传阅录像带的时代,真正热爱电影的人,很多都产生于那个时代。我拍完《妈妈》,受到很多国家的电影节邀请,我记得那时去国外,没别的爱好,就去买录像带,带回来和朋友们看。就到今天,我家里还保存着许多老录像带。也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,我自己的许多电影,别人也是用录像带的形式传阅的,比如《北京杂种》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读书那会儿,张艺谋他们应该刚刚出道,你对前辈们怎么看?跟他们接触过吗,读书的时候?

张元:张艺谋早期善于将文学作品,变幻为影像,很美地展现出来。去年我去意大利的一个以造酒而闻名的小镇,一个酒庄的老板家里,茶几上摆了一本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他还痴痴地问我:中国就是那样吗?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们的电影在当时很成功,我感兴趣的是,你们这拨人,和他们也差不了几岁,但几乎没有一个去延续他们的路子,为什么?

张元:拍电影一定要有针对性,叙事、美学选择的针对性,我做第一部片子的时候,当然也是有针对性的,他们站的角度非常高,我,或者说我们放得比较低。我们看到太多虚假的东西之后,就想:你是否能先把一个东西给描绘清楚了,是否能让摄影机镜头“看到”一点儿真的东西?我们千万不要

■在叙述上,在整个表达上,张艺谋们都有一种端着的、拿腔拿调的意味,需要一种大的背景啊、宏大叙事啊,强调那种很厚重的文化氛围,有一种辉煌感。我觉得他们和我想象中的那种真实离得远了。

■我是希望把我的心,摆在这些人(普通的小人物)面前,和这些人站在一起,因为他们都是值得我们理解、同情、宽容的人。

■艺术家是最没有力量的,是最软弱无力的人,是最没有权力的人。如果你想获得权力,你有权力,那么,你就不是艺术家了。

■不能简单地被一些大投资的影片所迷惑,我们要看到那些生生不息的有可能自己拿出几万块钱来拍电影的人,这些人才是真正从心底里有彻底追求的人。

忘记电影最初的本质的:电影最初都是从记录开始的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,我们从《小城之春》《十字街头》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《七十二家房客》里能看到一些非常真实的、当时社会生活的味道,那些导演能捕捉到非常丰富的当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质感。后来到了所谓第四代,像谢飞、郑洞天、谢晋,他们某种程度上都在延续过去的那种叙述方式。到了第五代,到了《黄土地》《一个和八个》,包括《红高粱》这种片子出来以后,它在视觉和影像上颠覆了一些过去的东西,对我来说,虽然这些片子也曾经震撼过我,但是我觉得它在叙述上,在整个表达上都有一种端着的、拿腔拿调的意味,需要一种大的背景啊、宏大叙事啊,强调那种很厚重的文化氛围,有一种辉煌感。在这个时候,我觉得他们和我想象中的那种真实离得远了。我在1989年拍《妈妈》的时候,直接把记录的彩色片放到黑白片当中,实际上也是想提醒观众:这些个纪实段落,和我的剧情段落,它们之间到底相差多远,它们是什么关系。我要提醒大家,我们是不是正在靠近真实?

《妈妈》其实公映过
崔健其实并不“一无所有”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现在该轮到《妈妈》了。当时怎么就做了国内第一部独立电影?

张元:当时有个短篇小说《弯弯的白杨树》,有人把它改成了剧本《太阳树》,儿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,导演是张艺谋的一个同学,他邀请我做摄影。后来几影厂不拍了,转到八一厂,八一厂也没拍。我就决定自己拍。那个剧本一开始就打动了,那些智障的孩子,还有智障孩子的母亲,他们的命运很吸引我。我找了几万块钱开始拍,主要场景就是我大学毕业后在西单租的房子。今天看,场景有点拘谨,简单了点,但是很真实,可以说有一种彻底真实的味道。

《妈妈》是王家卫带到法国南特电影节上去的,没想到一下就获了大奖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《妈妈》其实还是公映了。

张元:对。西安厂的人看了,很喜欢,就挂了他们的厂标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我是60年代生人,这代人很多都是崔健的“哥们”,请多谈谈那部《北京杂种》,谈谈崔健。

张元:那是1992年拍的。当摄影机一转动,崔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说话的一瞬间,我就知道这个电影是没办法正式通过了,因为他们一张口就是带脏字的。这种真实的气息,是没法想象能在九十年代的中国银幕上去公开放映的。我记得,当时还没有剪辑完,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就第一次放映了《北京杂种》三十分钟的片段。那次放映时,很多欧洲观众特别震惊,他们一直在跟我说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能闻到胡同里面的味道,酒的味道,臭味,都能呼吸得到。也就是这个电影捕捉到了一些真实的气息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怎么认识崔健的?

张元:我第一次见崔健,我认识他,他不认识我。那会我在读书,他到电影学院的那会去演出。虽然之前都听过他的《一无所有》,但是他在现场,站在人



张元作品:《妈妈》(1989);《北京杂种》(1992);《儿子》《东宫西宫》(1996);《过年回家》《钉子户》(1998);《疯狂英语》《金星小姐》(2000);《我爱你》《江姐》《绿茶》(2002);《达达》(2009)。

群前面,他一张口,那种气氛相当震撼。他是个诗人,他用他的音乐表达了那个年代的精神。

其实,我跟崔健最早的合作是在1990年,我为他的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》拍MTV。他带了一大堆西方的带子来找我。我当时连MTV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是把它当成电影来拍的,我们拖了两卡车的泡沫来做雪,还运来了飞机头做鼓风机。风一吹起来,整个人都站不住。我做的时候,香港的杜琪峰也正准备拍崔健的歌,他看了我们的片子后就放弃了,说:他们做得很好了,我们没法超越。杜琪峰和崔健的关系非常好,我们就一起商量做《北京杂种》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《北京杂种》所呈现的艺术圈,特边缘,可不可以说是今天798的黑白版和朴素版?

张元:798是今天的产物,我想它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。而且今天的798更像是一个旅游胜地,满街的咖啡厅。

一听到“第六代”就糊涂
“被招安”是因为想回家

星期柒新闻周刊:我注意到第六代特别喜欢弄纪录片。

张元:我一听到第六代,就糊涂,你们可以说谁谁谁爱弄纪录片,最好别说第六代,被你们称为第六代的大多,好像中国除了第五代就是第六代,这个不对。

我是真的拍了很多纪录片,像《疯狂英语》、《钉子户》、《收养》等等。我的一些电影中,也含有纪录片的味道。事实是,不是所有所谓的第六代都拍过纪录片。他们各有各的风格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你的电影一直在国外获奖,可是中国人却看不到。怎么回来的呢?是那部《过年回家》吧?

张元:我当时正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: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拍电影,但是它们没法和中国的观众见面。后来很多人用这种方式(独立制片)去拍电影,包括王小帅、何健军、娄烨、贾樟柯,但也都面临共同的困境,就是他们的电影也没办法在中国上映。我们的片子都变成被国外电影

拍摄了《儿子》;在《绿茶》里面拍摄了一个非常分裂的女人;拍摄了《看上去很美》里的这些孩子;最近做完的《达达》,拍了一个在胡同里面这么性感的,却又是孤苦伶仃的一个普通女孩。我好像是不知不觉地拍摄了这些东西,但是到今天,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去想,我是希望把我的心,摆在这些人面前,和这些人站在一起,因为他们都是值得我们理解、同情、宽容的人。当然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看的,那些井下的矿工,在生活里面得不到保障的流浪的孩子,被拐骗的儿童,所有这些人。我希望很多生活里最真实的东西还能再不断地跟我碰撞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中国的电影现状如何?似乎已经很商业,或者说商业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。

张元:艺术电影虽然是发展的时间不长,但是在西方,特别是欧洲,对电影有很多革命性的突破与变化。那么今天,最有霸权的,就是好莱坞,能和它抗衡的有谁呢?艺术电影还有没有必要存在,艺术电影是不是真的死亡了?纯工业的就是死了。好莱坞电影本身也在挣扎,像这些年好莱坞获奖的电影,《朗读者》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《米尔克》,都不是大片。

中国电影也一样,不能简单地被一些大投资的影片所迷惑,我们要看到那些生生不息的有可能自己拿出几万块钱来拍电影的人,这些人才是真正从心底里有彻底追求的人,他想追求自己的梦想,这些梦想是有意义的,永远不会过时。而也一定是在这样的电影当中,会出现一些特别闪光的东西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第六代里面,宁浩、陆川已经拍了商业片,贾樟柯说也会尝试拍,你呢?

张元:商业片就是卖座的影片,是不是?我曾经的《我爱你》,很卖座,两百万的投资,两千万的票房,那是不是很商业?我是不是已经是个商业片导演?

下一部电影年底开拍
一部有卡夫卡味道的黑色喜剧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谈谈你对国内导演的看法,张艺谋、陈凯歌、田壮壮、贾樟柯、王小帅、陆川等等?演员呢,有没有能成大气的?

张元:他们都是很棒的导演,都在用尽全力实现自己。别一来就批评别人,大家都不容易。我觉得,我们都是在追求过程之中的人。而且,这个世界,没有真正完美的东西,而且,我也不认为会有完美的人生。没有完美的人,没有完美的作品,只有我们人追求美的过程是值得称颂的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:说说你的下一部电影。

张元:片名《刽子手的花园》,黑色的,也可能是喜剧的。张小波十五年前把书给我,我们还很年轻,但当我拿起这本书,已是十五年后了。他书上有句书评:“它在作家中默默地被公认”。这像中国的今天,谁也不说谁好,但是好东西,大家心里都清楚。看了才发现,原来我这个朋友是个那么有才气的小作家。小波自己时常责骂我,说我为什么在他人到中年后,才对他感兴趣。

总之,会是一部很好的电影。我说它有着卡夫卡《城堡》那样的寓意,又有纳博科夫的现实。现在还在调整剧本,希望年底能开拍。